

朱熹与辛弃疾、陈亮关系考辨

金国正*

<目次>

1. 绪论
2. 朱熹与辛弃疾
3. 朱熹与陈亮
4. 鹅湖之会与辛陈之道
5. 结论

1. 绪论

朱熹作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一代文化伟人，与同时词坛领袖辛弃疾以及布衣名士陈亮的交往一向被传为佳话。如称朱、辛为“双子星座”，朱熹“独同词国领袖辛弃疾倾心相交，在道德言语、政事文学上志同道合。”¹⁾而在朱熹与陈亮之间，虽有“王霸义利”之辩，但自淳熙十年以后，陈亮“每逢先生生辰，虽居千里之外，必遣人问遗，岁以为常。”²⁾淳熙十五年陈亮在给张栻之弟张杓的信中自陈“今新安(朱熹)然独存，益晚岁之好。”³⁾两人情好似并不因学术同异而有所改变。朱、辛、陈三人作为南宋中期的文化代表人物，人生道路、学术追求、事业成就迥然不同而旨趣志向却相契相投，后人报以热烈的赞扬与歆羡自然并不为过。但朱熹与辛弃疾、陈亮的关系

*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1) 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第1版，p.906.

2) 王懋竑《朱子年谱》卷3，北京：中华书局，1998.10.第1版，p.157.

3) 陈亮《与张定叟侍郎》，《陈亮集》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87.8.第1版，p.383.

真有那么“美好”吗？其中恐怕有些小小偏差，后人不察混而论之，未必符合历史真相。

2. 朱熹与辛弃疾

先看朱熹与辛弃疾的友谊。据束著《朱子大传》考证，朱熹与辛弃疾初次相识在淳熙五年，其年八月两人相见并曾论及糞船插德寿宫旗子事⁴⁾。此后朱与辛交往不断，维持了终身的友谊。两人的直接交往，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一是淳熙五年至八年，当时辛弃疾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方任上，而朱熹也以出山大儒姿态知南康军（淳熙六年三月至八年四月）；二是绍熙三年，辛弃疾在十年之废后起为福建提点刑狱，朱熹则在福建建阳山居，两人有地利之便相往来；三是绍熙四年八月辛弃疾再至福州任安抚使，九月间访朱熹并同游武夷。考虑到辛弃疾有数度闲退的经历，而朱熹更是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学术活动上，两人的几番交游集中在一方或双方“入世”之时就显得比较有趣味，说明两人之交的重点在政事上的合作与参谋，“政”合为主而“道”合为辅，“公”谊居多而“私”情甚少，什么文学上的相契相投则是谈不上的。

辛弃疾对朱熹可说衷心推戴、诚恳求教。乾淳之时理学虽远未取得官学地位，但理学流行、士子向慕已成为普遍的社会习尚。朱熹在与辛弃疾相识之前迭经论战，已经享有“当代大儒”声望；而辛弃疾好学不倦，早在乾道六年任职司农寺主簿时即与张栻和吕祖谦相识，亲炙理学，景仰朱熹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辛弃疾曾有《寿朱晦翁诗》：“西风卷尽护霜筠，碧玉壶天月色新。夙历半千开诞日，龙山重九逼佳辰。先心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真可谓推崇备至。再如辛弃疾的《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其一云“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咏诗坐钓矶。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以“帝王师”视朱熹，也是很高的期许。庆元六年三月初九朱熹去世，在党禁的政治氛围中辛弃疾奋然为文吊祭，云“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辛弃疾对朱熹的道德学问存终生的尊

4) 束景南《朱子大传》，版本同上，p.475.

敬，而在具体的政事上，淳熙七、八年间时任江西安抚的辛弃疾密切配合朱熹消弭荒旱之灾，绍熙间任闽宪、闽帅时又屡屡问政于朱熹，在经界、钞盐以及备安库等政见、措置上多所取法。由于两人社会定位的不同，辛弃疾对朱熹只有礼赞颂扬，我们看不到他对朱熹有些微的疵议。

朱熹赏识辛弃疾的临事之才，在《朱子语类》中有如下记载：

直卿言辛幼安帅湖南，赈济榜文只用八字曰：劫禾者斩，闭粜者配。先生曰：这便见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两榜便乱道。又曰：要之只是粗法。⁵⁾

但朱熹对辛弃疾之为人却始终持保留态度，在与辛弃疾的交往中谨小慎微，实在称不上同稼轩“知音”、“倾心”。两人交往之初的淳熙八年，即有辛弃疾私贩牛皮、为知南康军的朱熹截获事。朱熹在与黄灏的通信中谈到此事：

辛帅之客舟贩牛皮过此，挂江西安抚占牌，以帘幕蒙蔽船窗甚密，而守卒仅三数辈。初不肯令搜检。既得此物，则持帅引来，云发赴浙东总所。见其不成行径，已令拘没入官。昨得辛书，却云军中收买。势不为已甚，当给还之，然亦殊不便也。⁶⁾

“不成行径”、“殊不便”之语，透露出朱熹对辛弃疾的不满，也体现了两人在治政风格上的不同：朱熹之行政，表现在赈灾不遗余力、驭吏严重不贷，关注民生；辛弃疾之行政，雷厉风行，善于理财，颇能在体制中腾挪变化以求治效，重视民治。创飞虎军时他敢于压下御前金字牌，与此处“私贩牛皮”的行为同是他临事能行机宜、不为循规蹈矩的表现。辛弃疾的行事风格与晁面盎背的儒者朱熹是格格不入的。也许是在这类事上印象太深，日后朱熹在与学生谈到辛弃疾的时候反复强调辛弃疾“可用”而“赏罚”须明：

辛幼安亦是个人才，岂有使不得之理！但明赏罚，则彼自服矣。今日所以用之

5)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1，北京：中华书局，1994.3第1版，p.2717.

6) 朱熹《与黄商伯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第6，四部丛刊初编本。

者，彼之所短更不問之。視其過當為害者，皆不之恤。及至廢置，又不敢收拾而用之。

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他，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着，便如終廢。此人作帥亦有勝他人處，但當明賞罰以用之耳。⁷⁾

朱熹批評朝廷不能用辛棄疾，卻又指責其“過當為害者”、“縱恣”，雖能知人，却未必能明稼軒本心⁸⁾。我們將其對辛棄疾的指責與朝廷罷廢辛棄疾時的制書相比較：

肆厥貪求，指公財為囊橐；敢于誅艾，視赤子猶草菅。凭凌上司，締結同類，憤形中外之士，怨積江湖之民……⁹⁾

這些大概就是朱熹所說的辛棄疾之所“短”、“過當為害者”，朱熹比朝廷高明的只是還想到要用其長，所以他對學生說的那兩段話與其說是在為辛棄疾鳴不平，不如說意在批評朝政——這也是道學批判現實精神的體現。

紹熙三年春，辛棄疾起用為福建提點刑獄，在閩中山居講學的朱熹是他首先要咨訪的對象。他遣人送去禮物和書信，朱熹回了信：

光奉宸綸，起持憲節。昔愚民犯法，既申震讟之威；今聖上選賢，更作全安之計。先聲攸暨，慶譽交興。伏惟某官，卓犖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脍炙士林之口。轎車每出，必着能名；制闈一臨，便收顯績。茲久真庭之逸，爰深正寧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張敞處閑之日？果致眷渥，特畀重權。歌皇華之詩，既諭示君臣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潛消郡國之奸。第恐賜環，不容暖席。熹苟安祠祿，獲托部封。屬聞斧綉之來，嘗致鼎糈之問。尚煩縟禮，過委駢緘。雖雙南金，恐未酬于鄭重，況一本薤口，亦奚助于高明。但晤對之有期，為感欣而無已。¹⁰⁾

7)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32，版本同上，p3179。

8) 如辛棄疾販牛皮事，在朱熹眼中屬於“違法亂紀”，但實際上是辛棄疾善于斡旋的表現。鄧廣銘先生詳辨之，可參看《鄧廣銘治史叢稿》中《讀〈漫談辛稼軒的經濟生活〉書後》一文。

9) 崔敦詩《辛棄疾落職罷新任制》，《西垣類稿》卷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 朱熹《答辛幼安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85，四部叢刊初編本。

从书中“尚烦縻礼，过委辨臧”等语，可见“晤对之有期”是在辛弃疾卑辞厚币的请求下才同意的，就朱熹本心而言未必深愿此番交往。何况辛弃疾既为地方官吏，诚恳求教，朱熹不与之交接也说不过去。朱熹在九月同刘焄的信中流露了自己与辛弃疾的真实关系：

今年缘与宪车（辛弃疾）相款，大得罪于乡人。其实不曾开口说一字，渠问亦不深应，不谓乃得此谤。¹¹⁾

朱熹似有意要疏远与辛弃疾的关系，所以他拒绝士人求其向辛弃疾举荐的要求，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

辛弃疾是朝廷起废为监司，初到任也须采公议荐举。他要使一路官员，他所荐举须要教一路官员知所激劝是如何人。他若把应副人情，有书来便取去，这一任便倒了。¹²⁾

辛弃疾向朱熹问政，朱熹答以三句话：“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¹³⁾。这与一年多后他为辛弃疾之二斋题名“克己复礼”、“夙兴夜寐”的精神是一致的，寓规劝于勉励。在他看来，辛弃疾终究是纵恣不羁之人，唯有以道德性命之说约束自敛，方能克服所短。绍熙三年六月辛弃疾专程赴建阳庆贺朱熹考亭新居落成，自然又有问政之意。朱熹事后在给黄干的信中说：“牒试中间辛宪、汤卒过此，皆欲为问。既而皆自有客，不暇可开口。”¹⁴⁾ 交浅言亦浅，朱熹并不曾特意为辛弃疾安排晤谈机会。

朱熹并不能完全理解辛弃疾为政的各项举措，前引“私贩牛皮”事是一例子，在对待辛弃疾创置的飞虎军的态度上又是一例。辛弃疾在淳熙七年湖南安抚使任上为地方治安计特意创建了飞虎军，“此军一成即雄视江上，亘数十年而犹为劲军。……奈稼轩甫经离去湖南帅任，即异论纷起，或谓非便，或请改隶，或主移屯，而又以主持非人，风纪莫保，亦遂时染翊悍之习。”¹⁵⁾ 在这些“异论”中，即有朱熹之一说：

11) 朱熹《答刘晦伯》书二十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第四上，四部丛刊初编本。

1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07，版本同上，p.2672。

1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2，版本同上，p.3180。

14) 朱熹《答黄直卿书》32，《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第1，四部丛刊初编本。

15) 邓广铭《辛弃疾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第一版，p.78。

潭州有八指挥，其制皆废弛。而飞虎一军独盛，人皆谓辛幼安之力。以某观之，当时何不整理亲军，自是可用，却别创一军，又增其费。¹⁶⁾

辛弃疾别创一军，正缘原有军队“其制皆废弛”，要行整顿牵涉颇多，更会触及朝廷的军事体制，这是辛弃疾无能为力的。以“土军”的名义创建飞虎军，却能避开种种阻挠，正是实干家的态度。即使如此，在飞虎军创建的关键时候，还是降下了“御前金牌”令其住手。辛弃疾不为所动，竟然压下金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建军工作，再呈报朝廷，“开陈本末，绘图缴进，上遂释然”¹⁷⁾，使这一举措不致半途而废。朱熹所论，正表明这位大儒也并非全知全能，军事并非其所长。

最能反映朱熹对辛弃疾看法的要算前已提到过的《答辛幼安启》，其中“卓犖奇材，疏通远识”数语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是朱熹对辛弃疾所作的最好“定评”，但我们只要看到前面所述他与辛弃疾交往的实情，再想想此评乃是对辛弃疾本人的贺启，言语之间礼貌居多，我们以为可作“定评”的话语在朱熹本人未必出自至诚。辛弃疾能名已著，并不在于此启之发明。这里最可注意的倒是对辛弃疾文学创作的评价：“游戏文章，亦脍炙士林之口。”辛弃疾有《美芹十论》、《九议》等论政文章，这些当然不会是“游戏文章”；辛亦能诗，然而置之当时诗人间，或者只能列于三流之间，自然不可能“脍炙士林之口”。这一评语只能是针对辛弃疾的词而言。以辛词为“游戏文章”，在辛或能受之无嗔，在朱则不可不谓无目之评。辛弃疾在宋代词人中虽属专力作词者，但并不像北宋柳永那样以词人自命，他自有事业、志向在。因此其门人范开说：“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明，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朱熹虽亦有词，但他连诗人都不要做，作词更自然是“游戏文章”。他视已作如此，亦以之视辛词。在他以上的评论中，我们看到他以辛弃疾“脍炙士林之口”的“游戏文章”与“经纶事业，股肱王室之心”相对应，在朱熹或许有揶揄、调侃之意，倒也不失为辛弃疾的毕生功业作了最好的总结。

朱熹以道德学问显耀当时，然不忘用世；辛弃疾以雄才大略小试于治，却成于歌词。两人的“交点”是明确的，即在于“政”。辛弃疾崇拜朱熹，几乎是以待师的态度

1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0，版本同上，p.3102.

17) 事见《宋史》辛弃疾本传。

来对待朱熹；朱熹对辛弃疾则始终以“治才”视之，不重其文，更不可能把他作为“吾道中人”来看待。辛弃疾嗜学，不过对当时的学派纷争并无轩轻，如淳熙八年吕祖谦逝，各派借机张吕之旗帜以明自己之学，辛弃疾却将朱、张、吕三家一起誉为“上承伊洛、远斥朱泗”的“道学”¹⁸⁾。这不能说明辛弃疾更高明，只是他超然于学派纷争之上，涵泳于理学之说，以理学“适性”，却不以理学立身。辛弃疾曾蒙朱熹赠言、赠匾，莅政风格的改变却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朱熹的影响。“养迈往之气，日趋于平；晦精察之明，务归于恕”¹⁹⁾的朝廷评价，不可能是得力于朱熹的“精辟指导”，而是辛弃疾自己在惨痛的仕途遭遇和复杂的官场环境中磨炼出来的。何况那几句话是“难得糊涂”的官场箴言，其实并不符合朱熹的思想，朱熹在严吏治这方面与辛弃疾并无二致，朱熹自己的浙东提举之行，实在就是不肯“晦精察之明”，才会导致与唐仲友的激烈冲突。

朱熹与辛弃疾之间说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谊”，最后也可以从辛弃疾听到朱熹病逝消息后所写的词中得到印证：

感皇恩 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

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句，自不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霁，青天好。一壑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故人少。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

词意悲痛少而感慨多，晦庵死讯在他阅读庄、老的心境中激起涟漪，却非巨浪，这种反应明显不是对待好友的态度。辛弃疾为朱熹的最后题词“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是基于公论，而非出于私谊。此足以说明辛弃疾的正义之气（同朝理学诸公曾经争以援引朱熹为尚，此时却三缄其口，适足与辛弃疾的反应形成对比），却不可以此证两人的“友谊”。

18) 辛弃疾《祭吕东莱先生文》，《辛稼轩诗文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2.第1版，p.114.

19) 楼钥《福建提刑辛弃疾太府卿》，《攻媿集》卷第35，四部丛刊初编本

3. 朱熹与陈亮

朱熹与辛弃疾合于“政”，与陈亮却是交于“学”。朱熹的学问大旨在乾道五年的“己丑之悟”时已经基本确立，其后或埋首著述，或与诸派论战，逐渐在学术界赢得其非凡名声。朱熹有着强烈的学派意识，颇有“党同伐异”气概。真理未必越辩越明，但朱熹的思想体系却是在论战中越辩越精密了。通过与湖湘学派的论战，他收纳了其领袖张栻；通过与吕祖谦的合作（编写《近思录》等），扩大了自己的影响；鹅湖之会他不能折服陆九渊，却也从论战中意识到自己的思想确有“支离”处，从而促使自己的经学思想发生重大飞跃。陈亮的永康学派以功利主义学说为基本内核，自然也在朱熹的清算之列。学术上的同异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但朱、陈交游的大体格局乃由学术同异所决定，两人之间所谓“相当不错的友谊”就多为虚像，有辩明的必要。

朱、陈之相慕。陈亮比朱熹小十三岁，学术声望远不及朱熹，学术主张上则如圆凿方枘之不能相合，性格差异更明显，一豪放而一沉谨。但陈亮保持了对朱熹的终生敬慕。早在两人相识之前的乾道八年，吕祖谦给朱熹写信介绍陈亮的思想变化说：“陈同甫近一二年来，却翻然尽知向来之非，有意为学，其心甚虚，而于门下向慕尤切。”²⁰陈亮一度潜研二程之学，曾编写《孟子提要》、《伊洛正源书》等道学著作，刊印《程氏易传》等书。这种思想行为与其说是受吕祖谦的规劝，不如说是受朱熹的光照影响。淳熙九年朱、陈两人既识之后，因论学方酣而书翰往来颇多，次年起每逢朱熹生日，陈亮均遣人送贺礼并作词寿之，不因其后学术论争出现齟齬而稍有改礼。²¹不独人前如此，人后陈亮对朱熹的敬慕之意也不少衰：

朱元晦，人中之龙也。²²

四海所望者，东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辛弃疾）与子师（韩彦古）耳。²³

20) 吕祖谦《与朱元晦》书2，《东莱集·别集》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 陈亮寿朱熹词存三首，见《陈亮集》卷39。

22) 陈亮《与林和叔侍郎》，《陈亮集》卷27，版本同上，p.323。

23) 陈亮《与辛幼安殿撰》，《陈亮集》卷29，版本同上，p.381。

诸贤凋落殆尽，独参政（周必大）与元晦岿然以镇之。²⁴⁾

陈亮借朱熹以推重他人，可见朱熹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朱熹对陈亮的欣赏却仅限于两人认识之初及其前。朱熹对陈亮的一度皈依理学甚为欣赏，曾经通过吕祖谦向他求要他所印刻的《三先生论事录》、林勋《本政书》等。²⁵⁾朱熹颇有“收服”陈亮之意，这是他同陈亮交往的最主要动力。

朱、陈之相识。朱熹与陈亮相知的最大中介是吕祖谦，但朱、陈相识却在吕祖谦身后。淳熙八年十月，朱熹除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因赈灾事巡历境内。朱、陈两人先是在武义明招讲论，又同路直至陈亮家中聚谈数日。陈亮获接大儒，兴奋之情自不待说；朱熹也欣赏陈亮的“伟论”，也为学术切磋有了新对象而高兴，因此表现出亲切和煦的一面。别后朱熹还邀请陈亮和陈傅良一同到绍兴府相聚，并寄去《战国策》、《论衡》和自注的《田说》诸书。朱、陈之间在时政和赈灾等事上意见一致，甚至在经学上也能相合，但在社会历史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在此时的论辩中已经显示出来。其时两人以切磋学问为主，我们从双方的来往书信中可以感受到其关系甚为友善。传说中朱熹在浙东按劾唐仲友，是因陈亮向朱熹进谗言所致。此事给人的印象是朱熹对陈亮言听计从，然而其事并不可信。朱、陈的友好关系，基本上仍在以学相知的范围内。

朱、陈之相辩。朱熹与陈亮的“义利王霸”之辩，在淳熙九年两人初识时已经开始，到淳熙十一、二年达到高潮，淳熙十三年后因双方都感没有结果而罢手。论辩本身，本文不欲置喙；这里仅指出论辩产生的意气伤及两人感情之事。陈亮对空谈心性命理的理学抱有反感，但他仍崇敬朱熹之学问；朱熹正以理学卫道者自居，不能容忍陈亮的妄加指责。朱熹对陈亮的学术批判加强了他自己对陈亮的恶感，《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等处言论对陈亮几乎没有什么好话。他的态度也影响了弟子们对陈亮的态度，其中可以詹体仁为突出代表：“比见陈一之国象，说詹体仁太博为门下士，每读亮与门下书，则怒发冲冠，以为异说；每见亮来则以为怪人，辄舍去不与共

24) 陈亮《与周子充参政》，《陈亮集》卷29，版本同上，p.380.

25) 束景南《朱子大传》，版本同上，p.348.

坐。”²⁶⁾

朱、陈论战升级以后，两人间友谊实已处于淡漠境地。若说有，也只是陈亮对朱熹的单方面致意。陈亮仍然每年逢朱熹生辰必致贺礼；朱熹则由陈亮学术的“粗豪”进而否定其为人处世之道。淳熙十一年春夏间陈亮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朱熹却在他后写信劝诫：“观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虽朋友之贤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处，不敢进其逆耳之论。”要求陈亮“惩忿窒欲，迁善改过”²⁷⁾，简直以其灾祸为“自招”者。陈亮接书之不快可以想见，愤然反驳导致论战升级就势所难免。淳熙十二年朱熹首先提出结束论战时，对陈亮已是厌其论、薄其学了。陈亮请求朱熹为其新起“抱膝斋”作二吟，只是应景文字而已，朱熹竟然一再拒绝。虽然朱熹的理由是双方“议论未定”，即意见未合，实际上并不可信。前此的淳熙十一年，陈亮曾请朱熹为寺观书写匾额，朱熹却改书张浚座右铭“谨言语、节饮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陈亮则把它轻送于人，这也许才是朱熹不愿为陈亮作《抱膝吟》的真正原因。两人“话不投机”至斯已极，交往中还会有多少“友谊”的成份呢？

4. 鹅湖之会与辛陈之谊

朱熹与辛弃疾、陈亮的关系最后也可以从三人的一次失败的聚约中求解。淳熙十四年陈亮邀约辛弃疾、朱熹相会²⁸⁾，欲就政事学术再行聚论。其时太上皇赵构已死，朝局大变，朱、辛、陈都是大有为之人，值此非常之时聚谈天下事也很正常。十二月陈亮由东阳先至带湖辛弃疾处相见，留十天，然后往游鹅湖，原先约定还要到闽赣交界处的紫溪会朱熹，然朱熹终因担心与辛、陈话头不合而临期爽约。朱熹为人之谨慎由此可知，而这种谨慎正是建立在与辛、陈相知不深的基础之上。淳熙十五年五月朱熹与陈亮都到了临安，两人有相见的机会，却未必有“倾心面论”之事。束景南先生

26) 陈亮《丙午夏朱元晦秘书书》，《陈亮集》卷28，版本同上，p.355.

27) 朱熹《与陈同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36，四部丛刊初编本

28) 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将此事系于淳熙十五年，束景南《朱子大传》辨之，详见其书p.653注

以为这是朱熹与陈亮的重要会面²⁹⁾，依据的是陈亮与张杓的信：“近者晦庵入奏事，侍郎适还从班，行都父老莫不以手加额，不敢以意分先后，亮时实见之。”³⁰⁾“亲见”并不就是“倾心面论”，不能因为朱熹在识陈亮之初有邀约就判定两人会倾心交谈。事实上从论战以后朱熹颇薄陈亮，此番相会必无深谈之事，两人自不致争论，陈亮书中所谓“益缩晚岁之好”似得其情而实非其情。

朱熹与辛弃疾、陈亮三人唯一的一次聚会是在绍熙四年正月初，辛弃疾召赴行在经建阳考亭，陈亮此时也在，于是三人终于有了一次讲论的机会。然而这次聚会对于三人各自的人生实在并无多大影响，可见此聚也只是机缘凑合而已，讨论殊为泛泛。倒是陈亮留下两篇像赞（《朱晦庵画像赞》、《辛稼轩画像赞》），加上陈亮所作《自赞》，确实“构成了一幅天然的龙潜虎跃的三英图”³¹⁾。

相比朱熹对辛弃疾、陈亮的淡漠，辛弃疾与陈亮之间则确实存在着惺惺相惜的英雄知己之情，其友谊的深度与浓度是朱熹对他们的友谊所万万不及的。辛、陈之交，时人已多阐明，这里只引辛、陈鹅湖之会后辛弃疾所作的《贺新郎》词序：

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又五日，同父书来索词，心所同然者如此，可发千里一笑。

陈亮既行之后，辛弃疾尚欲追路，不及而怅然，这份深情厚意，才真正是建立在对国事政局的共同见解、人生追求的共同趋向和性格气概的相投相契的基础上的，以之观照朱熹与辛、陈的友谊，其浅深、高下自不言而喻。

29) 束景南《朱子大传》，版本同上，p.671.

30) 陈亮《与张定叟侍郎》，《陈亮集》卷29，版本同上，p.382.

31) 束景南《朱子大传》，版本同上，p.913.

5. 结论

由此可见，朱熹与辛弃疾、朱熹与陈亮的友谊并不对等，从思想影响来说，自然以朱熹对后两者的影响为大。朱熹在士林中享有的崇高声望以及理学流行的时代风潮足以令辛、陈对朱熹仰慕不已，私人友谊的深浅其实并不影响辛、陈对朱熹的取法。但朱与辛、朱与陈相知不深的基本事实，往往被习见的“攀附”之风所掩盖。强调朱辛、朱陈的“亲密友谊”，常会由此得出不符合辛弃疾和陈亮的思想实际的论断。朱熹与辛弃疾、陈亮的关系可说“疏中有密、密而还疏”，这一方面由他们各自的人生追求、性格特点极为不同所决定，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实际毕竟相悬，比如辛弃疾对理学的亲近终究停留于“适性”层面而非“深造有得”，其文学创作中博取各种传统文化养分的一面远重于对性理的探究。而陈亮更是并不因敬重朱熹而改其学术主张，我们不能因其敬礼朱熹而推测他对朱熹事实上是“心服”的。

朱熹身负天下重望，士大夫争以结纳为荣。辛弃疾、陈亮对他期许极高，他们对朱熹的态度实在半师半友之间，因此朱熹虽没有隆盛的权位，在三人的交往中反而处于“主位”，主动权常操于朱熹之手。朱熹的道学人格决定了他同辛弃疾和陈亮虽有合作或论学的一面，却终究不能发展为深厚的友谊。在朱熹，这是以道交友的必然结果；在辛弃疾和陈亮这一边，由单向的崇仰而产生亲近的愿望，而这愿望的实现程度则是应打折扣的。我们大可不必涂饰他们与朱熹的“深厚友谊”，我们不必在研究中借朱熹以推重辛弃疾和陈亮的深刻，也不必借辛、陈以证明朱熹之通达。

《参考文献》

- 朱熹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鄧广銘輯校，《辛稼軒詩文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版，1995.12。
 鄧广銘点校，《陳亮集》，北京：中華書局，第1版，1987.8。
 樓钥撰，《攻媿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 呂祖謙撰, 《東萊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崔敦詩撰, 《西垣類稿》2卷,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束景南着, 《朱子大傳》, 北京: 商務印書館, 第1版, 2003.4.
王懋竑編着, 《朱子年譜》, 北京: 中華書局, 第1版, 1998.10.
黎靖德編, 《朱子語類》111卷, 北京: 中華書局, 第1版, 1994.3.
鄧广銘編着, 《辛稼軒年譜》,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1版, 1997.5.
元脫脫等編, 《宋史》, 北京: 中華書局, 第1版, 1977.

〈국문제요〉

주희, 신기질, 진량은 모두 남송시대의 문인으로 그들의 우정은 매우 깊은 것으로 알려져 있다. 본고에서는 주희, 신기질, 진량의 사적인 교류에서 출발하여 주희, 신기질, 진량의 우정이 사실상 그다지 깊지 않다는 것을 증명하고자 한다. 왜냐하면, 주희는 일찍이 신기질, 진량에 대하여 비평이 결코 공평하고 타당성은 없으며, 이해정도도 그다지 깊지는 않다. 반면 신기질과 진량 두 사람은 주희에 대하여 양모의 정이 깊다. 때문에 이들 세 사람의 우정은 대등하지 않게 드러나고 있다 할 수 있겠다. 하지만 이러한 특별한 우정관계는 그들 사상에 있어서 매우 깊은 의의를 전달하고 있는 셈이 되기도 한 것이다.

關鍵詞 : 주희, 신기질, 진량, 우정

이 논문은 2008년 11월 20일에 접수되어 2008년 12월 6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08년 12월 15일 편집회의에서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